

从道教善书探三教融合

——对《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研究

刘金成

中国民间普遍信仰关公，不仅得益于历代朝廷的加谥崇奉、话本曲艺的塑造渲染、神迹的显灵传说，同时还得益于佛、道二教对关公这一神祇信仰的拓展。关公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将，尊为伽蓝菩萨，而在道教中则演绎为惩恶扬善的关圣帝君。

“关帝信仰所以如此广泛，这与《三国演义》的普及，《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这本善书的存在以及扶乩时往往出现关帝神的旨意等不无关系。”可以说，关帝在道教的多神信仰中始终能够保持香火鼎盛的现象，同与其有关的劝善书册的广泛流通大有关系。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相传是关帝降笔的劝善良言。在流传过程中，通常还被称为《觉世宝训》、《觉世篇》，简而称之《觉世真经》。其撰作要旨是使世人醒悟，思过迁善，积德修身。在其不长的篇幅中，字字句句都展现出道家主张的济世度人的劝善理想，并且《觉世真经》还汲取儒家忠孝思想、佛教因果观念，在思想上汇三教为一言，所以经久耐读、广为流传。此外，它还常常和极富盛名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两册善书一起被统称为“三圣篇”。因此，《觉世真经》在篇目庞杂的道教善书中显得尤为经典。

一、《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产生及流传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是一部在民间流传的劝善书，提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劝善修行。此前并无专门研究，故而笔者决定对其进行初步探究。

（一）《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版本

笔者在对《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考察中发现，民间流传有两个版本的经文。

其一，直接引入，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将正文引入的《觉世真经》。出现在一块浙江宁波发现的清代碑刻上。见下：

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友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时行方便，广积阴功；救难济急，恤孤怜贫；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舍药施茶，戒杀放生，造桥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难解纷，损贵成美，垂训教人，冤仇解释，斗秤公平。亲近有德，远避凶人；隐恶扬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过自新；满腔仁慈，恶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虽不见，神已早闻；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若存恶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坏人名节，妒人技能，谋人财产，唆人争讼，损人利己，肥家润身；恨天怨地，骂雨呵风，谤圣毁贤，灭像欺神；宰杀牛犬，秽溺字纸；恃势辱善，倚富压贫；离人骨肉，间人兄弟；不信正道，奸盗邪淫，好尚奢侈，不重俭勤，轻弃五谷；不报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诱愚人，托说升天，敛物行淫，明瞞暗骗；横言曲语，白日咒诅，背地谋害；不存天理，不顺人心；不信报应，引人作恶，不修片善，行诸恶事。官词口舌，水火盗贼，恶毒瘟疫，生败产蠹，杀身亡家，男盗女

淫，近报在身，远报子孙。神明鉴察，毫发不紊，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我作斯语，愿人奉行，言虽浅近，大益身心。戏侮吾言，斩首分形。有能持诵，消凶聚庆，求子得子，求寿得寿，富贵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获，万祸雪消，千祥云集。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无私，惟佑善人。众善奉行，毋怠厥志。

其二，设定关圣帝君向民众宣说言教的情境之后再引入上述正文（即在以“敬天地”为开头的正文之前，引入了“帝君曰”等文字）的版本则广泛流传于坊间辑录在课诵、善书的文字材料中。现北京白云观刊行的由无名居士编撰的《济世善书》中收集的《觉世真经》就是这种版本。见下：

帝君曰：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之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于天地之间。若不尽忠孝节义等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独。勿谓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动一静，神明鉴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况报应昭昭，不爽毫发。淫为万恶首，孝为百行原。但有逆理，于心有愧者，勿谓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于心无愧者，勿谓无利而不行。若负吾教，请试吾刀。

这两个版本都在坊间有流传读诵，差异的出现可能是为了直入主题的方便，而在传播过程中便对经文进行了省略和简化。应该说，第二个版本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因为其中加入了“帝君曰”的预设语境较第一个版本更为丰富。其为正文的展开设定了关圣帝君言说的情境，也可以当做是引言。

道教善书是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在《感应篇》中有“太上曰”，在《阴文》中有“文昌帝君曰”，可见大多数善书的结构普遍都存有这样一个引言与正文的构成。所以，第二个版本是按标准的善书结构进行书写的，第一

个版本是第二个版本的简略版。

（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产生背景、成书年代

宋代以降，善书名篇《太上感应篇》在坊间、寺庙都大为盛行，乃至在私塾学堂也得到普遍学习读诵。可以明确，道教善书是在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并广为流传诵读。如果据此判断，《觉世真经》的成书时间最早也不出宋代。

关帝信仰在历朝历代多次被封建统治者冠以复杂繁多的尊称宣传。在宋代，关帝信仰风靡，宋徽宗就曾两次加封关帝称号。第一次，在崇宁二年封为“崇宁真君”。第二次，在宣和五年，封为“义勇武安王”。在宋代，关帝的封号始终没有出现涉及有“帝君”的字样。但是从经文题目上可以发现，关帝在经文中是以“关圣帝君”的身份出现。这就说明，《觉世真经》的年代可能还到不了宋代。

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关帝才有了“关圣帝君”这一称呼。“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由此可知，关圣帝君这一尊号来源于万历皇帝的加封。应当认为，《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关帝之名降鸾的道教书籍。

（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流传情况

《觉世真经》作为道教善书，它面对的不仅是晨钟暮鼓的道观中的道士，其更多的阅读对象应是信仰的普罗大众。对于偏僻乡野识字不多的民众而言，《觉世真经》作为宣传信仰的媒介仅仅存在于书面上的文字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了广泛吸收信众，《觉世真经》除了以书册为主要传播的形式外，还衍生出现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在之前例举的省略版本清代《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刻就是刻石勒碑的典型代表，也就是通过将经文刻写在崖壁或者石碑之上的形式类型。此外，更有以图像、歌谣、讲说、演戏等劝善方式对《觉世真经》的演绎。“在太原，我曾经看到两个一起流动讲善书的女人，她们所讲的善书中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觉世真经》不仅从听觉上的传达满足了信众的需求，同样还以图样绣像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关圣

帝君觉世宝训图说》、《觉世经图说》。

关帝信仰虽然根植于中国，但是随着文化传播的影响，其信仰在海外也都有传承崇拜。《觉世真经》诵习之广泛，不仅在中国本土可以看到，而且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也对其刊行流传，诸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觉世真经》早在1730年于日本再版，北海道的华侨团体“中华会馆”尊奉关帝，把《觉世真经》全文雕刻在中华会馆内关帝神龛背后的木板屏风上。

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体现的三教交融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不可否认地是一部道教善书，然而其经文中蕴含的深刻理念却具有三教交融的和谐倾向。《觉世真经》既阐发道家的行善积德，又说儒教的忠孝，还说佛教的因果。其以惩恶扬善的情怀为道教祈禳，以善恶有报的认识为佛教结缘，以忠孝节义的追求被儒教尊崇。正是由于经文传达了三教交融的理念，集各家之所长为一言的和谐精神才被世人广为传颂、奉为经典。

忠孝节义历来都被儒家奉为伦理纲常的核心要旨。“忠”、“孝”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能起到调整人伦关系的作用，但《觉世真经》却对它作了特殊的强调与发挥，并把它作为道教劝善度人的在世修行。

关帝，无论在正史的严肃记载还是从小说演绎的流传中，其都表现出是一位彻底完善的忠臣形象。“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小说《三国演义》的叙事中，关羽在被迫投降于曹操的曹营生活中始终不忘与刘备的约定，始终挂记着一个“忠”字。从这一节描写可以看出，似乎关帝就是忠诚的化身及代言人。选取关帝的形象来阐述道教教义，本身就透露出一种深厚的儒教的忠君气息。可以认为，整个劝善就是建立在以儒教忠君思想为基础上的活动。再者，《觉世真经》在篇首就显示出较为强烈的儒教色彩。开首两句就强调忠孝节义为立身之本，“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之事”。人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完善忠孝、塑造个人健全人格。它认为：“若不尽忠孝节义

等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这就充分表达了道教在人生价值取向与儒教传统的趋同合一。

中国文化乃是以孝为主，以孝为根本的文化。儒典《孝经》上就有言，“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意思就是说，孔子认为教导民众真诚仁爱就要以孝为先。足以为得，孝在儒学传统中被推崇之高。“孝为百行原”，而在《觉世真经》的经文中借用关帝的口吻宣扬，孝是一切的根本、来源。“奉祖先，孝双亲”，《觉世真经》中对“孝”的宣讲，劝导着人们对父母长辈行孝，促进着家庭伦理道德的完善。对于社会伦理关系的重视，正是道教对儒教教义的传承和发展。道教尊重孝的儒家传统，关注人情，强调人伦。“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友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特别是其在家庭伦理中强调孝亲，在社会伦理中重视忠君。道教吸收这种关心家国的情怀，传承家国同构的中国哲学思想，扎实自身爱国爱教的传统，体现了道教与儒教思想的融合。

同样，深具佛教特色的因果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觉世真经》。佛教的思想性格是以因果相续的逻辑观念，所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佛教思想认为，因果关系作用于宇宙各个事物的生成变化中。专说佛教因果的《佛说三世因果经》中就有“一切世间，男女老少，贫贱富贵，受苦无穷，享福不尽，皆是前生因果之报”的话。因此，对宇宙变化解释深刻的因果观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觉世真经》中有类似的说法，“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觉世真经》之所以能够在民间信众中广泛流传，正是由于同这种对中国社会影响深刻的佛教思想产生了交融。“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如果作恶多端，则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报在身，远报儿孙”。《觉世真经》打通佛道之间的区隔，要求人们从善积德，告诫作恶必报。

就思想内容上来说，《觉世真经》强调积德

行善的道教度人要旨，承袭道教自身倡导的惩恶扬善的思想和积善成仙的修行法则，又不断援引儒释两家之说，丰富其内涵，宣扬善之普世。在个人修行上注重社会伦理道德的完善，吸取儒教学说的忠孝节义思想。在业报流转上又纳入了佛教深刻的因果报应认知，发展佛教理论的因果观。融三教思想于一炉的《觉世真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教思想合流的主流趋势。从劝导行善的角度，《觉世真经》宣扬“三教同源”。

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融合交流的过程。儒释道三教由起初各家之间的相互格义的争辩，最终走向了“三教一家”的局面。这种宗教和谐的理念也在《觉世真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整篇经文中，既有道教济世度人的劝善思想，又饱含了佛教因果业报的认知观念，同时在价值判断上又遵从了儒教的忠孝节义。《觉世真经》所表现的三教交融是一种和谐圆满的状态。

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表达的和谐追求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自明代通过扶鸾的方式产生以来，就在民间受到道教信众的普遍欢迎，得到流传广泛。在《觉世真经》的语境下，关帝的形象不仅只是有求必应的神仙形象，同样具有维护社会伦理、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主义形象。对其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关圣帝君形象的塑造，而且对道教积功立德思想的领悟理解、了解民间的社会信仰情况、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等各个方面都有更深入地认识，同时还能明确的是道教自其产生就把其对和谐的追求同社会现实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

《觉世真经》的内容秉承了道教济世度人、积功立德的传统，同时从追求“善”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儒教忠孝观念及佛教因果观念相融合。这为道教发展、中国哲学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教由论辩走向融合，同时又保持自身的崇拜对象及价值系统。三教融合不仅意味着中国思想的成熟，而且通过和谐形态的教化劝善提供了普世伦理的可能。没有一种全球性的

伦理即世界伦理，便没有一种全球性的共同生存。《觉世真经》阐发了三教思想的和谐，拓展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新的向度，也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宗教之间和谐交流提供了参考借鉴。同时，对于思考当下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善福报，作恶祸临”，文中提倡的惩恶扬善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高尚道德的重要体现。这样的思想观念对形成热爱祖国、孝亲敬长、勤劳务实、诚实守信、善良淳朴的良好社会风气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部道教经典都会传达一种信念，《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惩恶扬善、立功积德的修行要求，同样还有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呼吁。道教的修行，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改造，实质更接近于和谐生活的标准，并努力使之无限地接近于道之本体的和谐状态。《觉世真经》塑造了中国特色的伦理形象，表达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

注：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卿希泰，李刚：《试论道教劝善书》，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第28页。

孙维昌：《清代〈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刻》，载《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第74页。

无名居士：《济世善书》，北京：白云观，2004年，第35页。

郑士有：《关公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郑士有：《关公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7页。

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孔汉斯：《世界宗教寻踪》，杨熙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5页。

（作者系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系
20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